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近代日本的对外认识

以幕末遣欧美使节为中心

郭丽 著

本书首先归纳、分析了幕府末年遣欧美使节的出使日记等资料，并参照日本由来已久的华夷世界秩序观予以评析，其次，选取幕末遣欧美使节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个例——福泽谕吉，重点考察了其对外认识发展变化的整体情况，再次，结合幕末开国思想的形成和演变，剖析并阐释了幕末至明治初期日本对外认识的基本形态，最后，梳理日本历史上与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文化交流与外交关系的变迁，概括分析了日本对外认识的发展规律与根本逻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史学论丛·外国史系列



近代日本的对外认识

以幕末遣欧美使节为中心

郭丽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日本的对外认识:以幕末遣欧美使节为中心/郭丽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2

(博雅史学论丛·外国史系列)

ISBN 978-7-301-19708-0

I. ①近… II. ①郭… III. ①对外关系-研究-日本-近代
IV. ①D8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1603 号

书 名: 近代日本的对外认识——以幕末遣欧美使节为中心

著作责任者: 郭 丽 著

责任编辑: 陈 甜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708-0/K·081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mm × 1092mm 16 开本 19.5 印张 340 千字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幕末日本遣使欧美始末	15
第一节 外患风云与开国事始	15
一、北地边患与海防论抬头	15
二、“黑船来航”与开港开市	19
第二节 德川幕府遣使欧美	24
一、万延元年遣使美国	24
二、文久二年遣使欧洲六国	26
三、元治元年遣使法国	28
四、庆应元年遣使法英	30
五、庆应二年遣使俄罗斯	31
六、庆应三年遣使法国	32
第三节 遣欧美使节及其出使日记	33
第二章 万延元年遣美使节的美国体验	41
第一节 副使村垣范正的美国印象	41
一、社会礼俗	42
二、政治外交	46
三、科技军事等	49
第二节 随从玉虫左太夫的美国理解	52
一、社会礼俗	53
二、政治文教	57
三、科技军事等	61
第三节 随从佐野鼎、木村铁太的美国探索	64
一、社会礼俗	65
二、政治文教	68
三、科技军事等	73

2 近代日本的对外认识

第四节 副使与随从之比较	76
第三章 幕末遣欧使节的欧洲见闻	85
第一节 文久二年的欧洲六国探索	85
一、使节团的“探索报告”	85
二、使节团成员的六国考察	92
第二节 元治、庆应年间的欧洲印象	114
一、元治元年遣法使节	115
二、庆应元年遣法英使节	117
三、庆应三年遣法使节	124
第三节 欧洲见闻的特点	131
第四章 幕末遣欧美使节西洋认识评析	144
第一节 日本的华夷世界秩序观	144
一、“日本型”华夷思想	145
二、日本中心主义论调	151
第二节 幕末遣欧美使节的西洋观	157
一、“汉学者”使节:褒贬全般	157
二、“洋学者”使节:专注科技	167
第三节 “和魂洋才”论	176
第五章 幕末遣欧美使节的中国认识	182
第一节 香港、上海识见	182
一、香港见闻	182
二、上海印象	191
第二节 海外华人与中国事情	196
一、邂逅海外华人	196
二、关注中国事情	203
第三节 幕末使节中国认识的特点	206
一、评价严苛	207
二、视角偏颇	209
第六章 幕末遣外使节福泽谕吉的对外认识	213
第一节 福泽谕吉的西洋文明观	213
一、三次出访欧美与“切割售卖”西洋文明	213
二、文明开化初期针对西洋文明的独立意向	218
三、明治十年前后对西洋文明展开攻势	224
四、近代日本西洋认识的缩影	228

第二节 福泽谕吉的亚洲霸权论	230
一、弱肉强食:亚洲霸权论的认识基础	230
二、内安外竞:亚洲霸权论的形成过程	233
三、源远流长:亚洲霸权论的历史传承	238
第七章 幕末的开国论及其对外认识	243
第一节 开国论的形成	243
一、尊王攘夷论	243
二、倒幕开国论	247
第二节 开国论者的西洋文明观	251
一、吉田松阴:“保存神州之本体,采用万国之器械”	252
二、横井小楠:“明尧舜孔子之道,尽西洋器械之术”	256
三、佐久间象山:“东洋道德,西洋艺术”	259
第三节 “大攘夷”与近代化胎动	262
一、“大攘夷”论	263
二、日本近代化论	265
终章 日本对外认识的逻辑	
——从“攘夷”、“师夷”到“制夷”	269
第一节 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	269
一、中国认识的演变	269
二、西洋认识的演变	274
第二节 大国情结与“师夷长技”	280
一、乐于与强者为伍	280
二、善于以强者为师	284
参考文献	290
一、中文部分	290
二、日文部分	295
后 记	304

绪 论

—

日本位于东亚一隅,四面环海,岛屿众多。若欲与外部世界接触,要么外国人渡海前来,要么日本人渡航海外。早在7、8世纪时,日本就曾十数次派遣大规模的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以寻求新技术、新知识。这些使节以及随行的留学生、学问僧学成归国后,移植来大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对盛唐文化予以全方位的吸收,促进了古代日本社会与文化的发展飞跃。之后,跨越万里波涛,前往中国以及天竺(印度的旧称)、吕宋(菲律宾的旧称)、暹罗(泰国的旧称)等东亚、东南亚国家的日本人络绎不绝。然而,在16世纪40年代之前,西洋以及居住于西洋的白种人,对于日本人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存在。

天文十二年(1543年)八月二十五日,^①一艘载有葡萄牙商人的中国帆船,在遭受狂风巨浪侵袭破坏后漂流到日本南端的大隅(今属鹿儿岛县)种子岛。葡萄牙商人的到来,揭开了日本人与西方人交流往来的序幕。关于葡萄牙人初来时的情景,萨摩藩的禅僧南浦文之在《火枪记》(1606年)中记载道:漂流而至的船只上乘坐有一百多人,其中有些人的容貌是迄今从未

① 受中国历法的影响,日本古代以来一直沿用以太阴太阳历(农历)为基础的历法,即以天皇年号纪年并依太阴历计算月份、日期,且以时辰为计时单位。到明治五年(1872年)十一月九日,明治政府颁布“改历布告”,宣布将停止使用太阴太阳历而改用太阳历(公历),并确定明治五年到十二月二日为止,翌日为明治六年一月一日(即太阳历的1873年1月1日),计时单位也由时辰改为小时。此后,常出现将太阴太阳历和太阳历混用的情况,到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开始完全采用太阳历。

因本书需大量引用明治维新之前的史料,为行文方便,统一沿用日本文献中通用的太阴太阳历(用汉字书写),并在括号中用阿拉伯数字加注相应的太阳历年份,以下同。

2 近代日本的对外认识

见过的,语言也全然不通。幸好有一个叫五峰的明朝儒生一同前来,通过用拐杖在沙滩上写字,与村长西村织部进行了笔谈。从笔谈中得知,“那些红毛碧眼的异端是西南蛮的商人”。^①

葡萄牙人给日本带来的“见面礼”,是当时西方的新科技产物——火枪。种子岛领主种子岛惠时、种子岛时尧父子不惜重金购得两支,并命令手下工匠尽快分解、研究,以了解、掌握其制造方法。其时日本列岛正处于战国大名之间争战频仍的“战国时代”,火枪这种便捷而又极具杀伤力的新式武器迅速普及开来。于是,为了获得铁、火药、硝石等制造火枪所必需的原材料,各大名积极推动与葡萄牙人之间的贸易,前来日本的葡萄牙商船以及与日本的贸易额逐年增加。作为贸易的副产品,葡萄牙的耶稣会传教士将以天主教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传入日本。天文十八年(1549年),耶稣会士沙勿略(1506—1552)等人来到日本传教,^②由此开始了“南蛮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所谓“南蛮文化”,是指由“南蛮人”所带来的文化。基于将周边民族、国家视为四荒蛮夷的华夷观念,东南亚一带在日本人眼里属于南蛮之地。因为以葡萄牙为首的西方商人和传教士是由西向南而来,然后再由南方北上来到日本的,故而被称为“南蛮人”。“南蛮文化”进入日本后得到迅速传播,天主教信徒遍及从大名以至乞丐的各个阶层,且遍布日本全域,甚至连非天主教信徒也被卷入了所谓的“南蛮风潮”之中。^③在这样的背景下,16世纪末、17世纪初,一些大名巧妙地利用幕府当局希望扩大对外贸易的心理,向西方国家派出了一些宗教使节团——天正遣欧少年使节团、庆长遣欧使节团。

天正遣欧少年使节团,是九州地方的天主教大名大友宗麟、大村纯忠、有马晴信等人联合派出的,主要成员包括伊东祐益(正使、13岁,大友宗麟的代理)、千千石直员(正使、13岁,大村纯忠的代理)、原麻留知野(副使、14岁)、中浦寿理安(副使、13岁)等四名少年。天正十年(1582年)一月二十八日,少年使节团一行由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范礼安(1538—1606)陪同从长崎出发,途经印度、葡萄牙、西班牙,于天正十三年(1585年)三月到达罗马,并谒见了教皇。少年使节团旅欧期间,所到之处均受到隆重的欢迎

① アルマント・マルティンス・ジャネイラ著、松尾多希子译:《南蛮文化渡来记》,サイマル出版会,1971年,第5—7页。

② 沙勿略是西班牙人,耶稣会的创立者之一,不过他来东亚传教是受命于葡萄牙国王。

③ 赵德宇:《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和热情款待,甚至还获得了罗马市的公民权及贵族称号。天正十八年(1590年)六月,少年使节团回到阔别八年又五个月的日本。其时,大友宗麟、大村纯忠等积极支持天主教的大名已不在人世。加之早在天正十五年(1587年)六月十九日,丰臣秀吉(1536—1598)颁布了传教士驱逐令,禁止传教士在日本传教并勒令他们离开。结果,天正遣欧少年使节团的四名成员中除伊东祐益病死之外,千千石直员被迫弃教,原麻留知野、中浦寿理安殉教而死。^①

庆长十八年(1613年)九月十五日,支仓常长等人受仙台藩藩主伊达政宗之命,在翻译兼向导、西班牙人传教士路易斯的陪同下启程前往罗马,此即庆长遣欧使节团。庆长遣欧使节团在途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时,支仓六右卫门接受了洗礼,成为正式的天主教信徒。一行抵达罗马之后,也获得了罗马市的公民权及贵族称号。但是,因被视为“日本奥州王”的伊达政宗不是天主教徒,支仓六右卫门作为其使节未能受到教皇的正式接见。后来,他以个人身份谒见教皇,并行教徒的吻足之礼。在使节团滞留欧洲期间,德川家康(1542—1616)于庆长十九年(1614年)在全国范围内下令驱逐传教士、关闭教会并禁止举行天主教仪式。德川家康死后,其后继者德川秀忠(1579—1632)等对天主教的打击更为严厉。到使节团归国时的元和六年(1620年)八月,天主教在日本更是处于风声鹤唳的境地。因此,为了保全已经接受了天主教洗礼的支仓六右卫门的身家性命,藩主伊达政宗对幕府当局谎称支仓六右卫门已经死去。^②

前近代的日本,仅向西方国家派出过天正遣欧少年使节团和庆长遣欧使节团。因为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随着日本国内对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排挤、镇压,这些最早踏上欧洲大地的日本人——遣欧使节团成员大多不得善终,更谈不上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了。到17世纪30年代,德川幕府连续几次颁布禁教令,断绝了与葡萄牙人和天主教的一切接触,并禁止日本人与海外往来。到宽永十八年(1641年),又将与天主教传教活动无关的荷兰人一律迁移到长崎的出岛,且限制外文书籍的进口,并终止了与东南亚国家的朱印船贸易。结果,日本的外交和对外贸易全部被置于德川幕府的统制之下,除荷兰、中国、朝鲜之外,与外国的往来一律被禁止。之后,除了偶尔有渔民漂流海外者,幕府和各藩再没有向西方国家派出过使节。

18世纪末期,俄罗斯势力的南下给德川日本敲响了边患警钟,海防思

① 参阅松田毅一著《天正遣欧使节》,朝文社,1991年。

② 参阅松田毅一著《庆长遣欧使节——德川家康与南蛮人》,朝文社,1992年。

4 近代日本的对外认识

想开始盛行。到嘉永六年(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培理(1794—1858)率“黑船”前来叩关,^①进一步激发了日本的民族危机感,使本已危机四伏的幕藩体制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面对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在攘夷论与开国论的纷争以及各种政治势力的对峙、纠葛中,明达之士提倡睁眼看世界,积极了解海外情势,幕府及一些强藩开始考虑遣使西洋之事。安政五年(1858年)“安政五国条约”的签订,使日本被卷入近代国际条约关系体系,在与美国、荷兰、俄罗斯、英国、法国等缔约国进行交涉的过程中,向这些国家派遣使节一事被提上议事日程。同时,西方各缔约国也积极斡旋,敦促德川幕府向自己国家派遣使节,并愿意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提供援助。自开市开港至明治政府成立,德川幕府先后向欧美国家派出了六个外交使节团。^②

幕末日本派出的六次遣欧美使节团分别为:第一次,为了交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批准书,幕府于万延元年(1860年)向美国派出了以外国奉行兼神奈川奉行新见正兴为正使,以箱馆奉行、外国奉行兼神奈川奉行村垣范正为副使,以小栗忠顺为监察使的使节团。第二次,文久二年(1862年),派遣以外国奉行、勘定奉行竹内保德为正使,以外国奉行、神奈川奉行松平康直为副使,以目付京极高朗为监察使的使节团,出访英国、法国、荷兰、普鲁士、俄罗斯、葡萄牙等欧洲国家。该使节团的主要任务,是与“安政五国条约”各缔约国交涉有关延期开放两港(兵庫、新瀉)两市(江户、大阪)的问题。第三次,元治元年(1864年),以外国奉行池田长发为正使,以外国奉行河津祐邦为副使,以目付河田熙为监察使的使节团出访欧洲。该使节团的任务,是为了要关闭已开放的横滨港而与各缔约国进行谈判。第四次,庆应元年(1865年)闰五月,以外国奉行柴田刚中为特命理事官的使节团前往法

① 因16、17世纪前来日本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船只大多漆为黑色,直到江户时代末期,对出没于日本海沿岸的来自欧美各国的舰船统称为“黑船”。后来,“黑船来航”专指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率舰来日。

② 幕末日本除了向欧美国家派遣过外交使节团之外,幕府和一些强藩还曾向海外派出过一些留学生,主要包括:文久二年(1862年)的幕府遣荷兰留学生,元治二年(1865年)的幕府遣俄罗斯留学生,庆应二年(1866年)的幕府遣英国留学生;文久三年(1863年)的长州藩遣英国留学生,元治二年(1865年)的萨摩藩遣英国留学生。到庆应二年(1866年),德川幕府解除了关于禁止留学和航行海外的禁令,福冈、佐贺、金泽、熊本、德山、仙台等藩竞相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同时,也出现了各藩的武士、儒者独自外出周游西方国家的情况。在幕末这些“洋行”者中,德川幕府向欧美国家派出的外交使节团是肩负着“国家”使命的正式使节团,且使节团中包括一些身份地位、学养阅历、职别所属等各不相同的成员,具有“举国”色彩。因此,本书主要选取幕府遣欧美使节团的相关资料,对他们的对外认识进行重点考察。

国,为横须贺制铁所招聘技师并购买机械,同时招募步兵、骑兵、炮兵等三军教官,并在完成主要任务之后顺访了英国伦敦。第五次,庆应二年(1866年),以箱馆奉行兼外国奉行小出秀实为正使,以目付石川利政为监察使的使节团出使俄罗斯。该使节团的任务,是与俄罗斯谈判有关桦太(即库页岛,以下同)边境划定问题。第六次,庆应三年(1867年),民部大辅德川昭武作为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代理,前往法国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并历访欧洲各国。

幕末遣欧美使节团除肩负着相应的外交使命之外,也担负着考察西洋事情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在日本外交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幕末遣欧美使节团成员留下大量出使日记,这些日记内容丰富、记述翔实,既为当时的日本人了解世界大势提供了鲜活的原始素材,也为后人研究幕末日本的对外认识留下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目前关于幕末明治初期日本遣使欧美的研究,国内的学者往往局限于对相关事件的过程、影响等进行大体概述,而少有实证研究,相关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偏重于对明治新政府派出的岩仓使节团进行研究,^①对幕末遣欧美使节的关注不多。第二,主要侧重于对当局遣使欧美这一举措或政策进行分析,尚无对遣欧美使节在异国他乡的具体见闻以及他们对异域文明的认知理解等的考证研究。而且,相关研究成果中多有夸大近代日本遣使欧美对其近代化进程的促进作用的倾向。第三,研究日本人中国观的论著虽不鲜见,但尚无针对幕末时期或遣欧美使节的专题研究,更无将近代日本的西洋认识与中国认识结合起来进行比对和综合研究的成果。在日本史学界,对幕末遣欧美使节团的研究同样不及对岩仓使节团的研究广泛和深入。而且,日本学者重实证,相关研究成果往往着眼于对幕末遣欧美使节出使期间的具体行程及见闻细节等进行还原性考证,在对当事者的思想认识进行深层次剖析方面较为欠缺,更少有对幕末遣欧美使节的对外认识进行综合研究的成果。

本书以“近代日本的对外认识——以幕末遣欧美使节为中心”为题,首先对幕末遣欧美使节的出使日记等原始资料进行分析、归纳,并参照日本的

① 岩仓使节团,是指明治政府在1871—1873年间向欧美国家派出的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主要由政府要员组成的使节团,是明治政府在确立了“求知识于世界”这一基本方针的基础上派出的,有明确的考察目的。岩仓使节团在出国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使节团的主要领导人各有不同的考察重点和分工,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组织了对口的考察班子,还拟定了详细的考察计划。岩仓使节团在考察欧美各国文物制度方面收获很大,对促进日本的近代化——大规模输入西欧文明并加以日本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华夷世界秩序观予以评析,以期对幕末日本对外认识的大体情况及特点做出较为全面、准确的描述。其次,选取幕末遣欧美使节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个例——福泽谕吉,对其对外认识发展变化的整体情况进行个案考察。再次,结合幕末开国思想的形成、演变情况,对日本幕末至明治初期的对外认识——明治维新的思想基础进行剖析、阐释。最后,梳理日本历史上与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文化交流和外交关系的变迁过程,在此基础上概括分析其对外认识的发展规律或逻辑。

二

考察日本幕末明治初期的对外认识,其学术价值可概括如下:

首先,剖析幕末明治初期日本的对外认识,是解读明治维新及日本近代化历程之独特性的重要视角。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进程中重要的分水岭,明治维新及相关问题也是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热点。一般认为,日本的近代化始于明治维新,是在“文明开化”的旗帜下,从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制度以及思想文化等开始的。当然,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引进,并非仅凭明治政府一声令下便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幕末以来对西方文化从抵触、排拒再到接受、融合和利用的过程。明治政府成立后,本着“求知识于世界”的宗旨,开始推行全面学习西方的政策。一些启蒙思想家也开始积极宣传“自由”、“民权”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实际上,“许多维新领导人和启蒙思想家全面学习西方的思想是在幕末时已具雏形的”。否则,“明治政权确立后,也不会立即走上向西方学习的道路”。^①

近代之初,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随着开港、开市而被强行纳入世界市场体系之后,能否转换观念、更新政权,就成为这些国家救亡图存之关键所在。而当时转换观念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识西方世界。幕末日本的遣欧美使节,是近代最早直接接触到西洋本土文明的日本人,他们走出国门睁眼看世界的经历,势必会促使他们重新审视日本并认识世界;他们穿越万里波涛游走于世界各地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也将引起他们对日本的现状与未来,以及日本在世界中的地位等问题的思考。有学者认为:日本人如何认识欧美,直接关系到日本受欧美的影响如何。“日本受欧美最大的影

^① 王家骅:《幕末日本人西洋观的变迁》,《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响是所谓‘近代化’进程。因此,(日本人如何认识欧美)与日本人如何理解‘近代化’息息相关。另外,涉及‘近代化’问题,就必然同时涉及‘传统’的日本这个问题。……日本人眼里的世界,几乎就是日本人所理解的日本(在世界中)的地位。”^①

诚然,近代化并不等于西洋化。如,有学者指出:“现代化过程的实质不是西化,而是工业化,即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②然而,时至19世纪中叶,由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阶段明显高于同时期东方的农业文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程度在客观上高于同时期中国、日本等东方的封建制国家,因而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近代化过程,在形式上就表现为学习西方并进行自我改造的“西洋化”过程。因此,对于东方国家和民族而言,近代初期能否认识到西方文明中的合理性,以及这些认识在多大程度上能为当权者和社会所认同,在现实的政治决策、社会变革中能发挥多大作用,将直接影响到自身近代化道路的选择及其进程。

其次,考察幕末明治初期日本的对外认识,也是解读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认识及亚洲政策的重要视角。

幕末明治初期是日本历史从近世到近代的过渡期,也是日本外交和对文化交流的重心由亚洲转向欧美的转折期。有学者指出:东方国家的近代化——“西洋化”,始于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应战”,“始于西方现代的文化传播,对本国的传统文化加以改造的过程”。而这种“文化传播”并不是在自身处于“文化真空”的状态下进行的简单模仿,而是选择性地融合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的一种“创造性行为”。即“在接触西方文化的同时,对本国的传统文化展开深入思考,不拒绝西方文化,也不是简单的抛弃传统文化”。“将本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加以比较,有选择地学习优秀的内容,将学到的东西与自己的传统文化融合并加以改造,还要处理两者之间所发生的冲突。”^③因此,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近代化,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自身传统与外来文化、特别是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所谓传统,是指历史上传承下来的社会习惯力量,存在于制度、思想、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控制作用。对于日本、朝

① 加藤周一:《日本人的世界像》,《近代日本思想史讲座8世界中的日本》,筑摩书房,1961年,第228页。

② 罗荣渠:《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理论思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③ [日]富永健一著,李国庆、刘畅译:《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0—31页。

鲜等儒家文化圈的东方国家而言,中国因素在其传统中的影响和地位不容忽视。因此,日本的近代化,除了要处理好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外,还需对自身传统中的中国因素进行变通和取舍。一方面,日本传统的世界秩序观,是在吸收儒家华夷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以自我中心论为特征的华夷世界秩序观。而要想实现“西洋化”,首先需正确地了解、认识西洋,不可一味地将西方国家视为野蛮落后的“夷狄”、“胡国”,而对其退避三舍或不屑一顾。为此,日本的华夷思想需做出相应的调整。另一方面,尽管日本在17世纪30年代已构筑起自己的华夷秩序体系——大君外交体制,但实际上仍处于东亚社会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之下。特别是在文化心理上,近世日本仰慕中国文化,中国仍是日本知识人心目中的精神家园。因此,幕末以来日本要将关注和学习仿效的目标由中国转向欧美国家,不仅关乎其对西洋的认识,也与其对中国的认知评价息息相关。

幕末的遣欧美使节,是近代日本最早踏上西方国家土地,并与西方人近距离接触的“洋行”者。正是在西洋之行的过程中,他们有机会与旅居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往来接触,并有机会前往中国体验、观察。有学者指出:“对于幕末明治初期的日本来说,在与西洋和中国的接触中,体现出相互结合的两个侧面。”一方面,最初的西洋之行也促成了与中国最初的接触,西洋成了与中国接触的媒介。另一方面,中国为日本的西洋之行做了准备,中国是日本与西洋接触的媒介。日本与中国的接触,不仅仅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其中还插入了西洋的因素。而日本与西洋的接触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的影响,且这种中国的影响中又掺杂有西洋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时期表现出的日本与西洋及中国的文化接触,可以形容为三角关系。”^①亦即说,幕末以来日本的西洋认识和中国认识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自从日本开港开市以来,西方国家成为中日关系和中日文化交流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日本人不仅通过西方国家接触、了解中国,甚至以西方人的视角认知、评价中国的事情。而欧美以西洋为中心的文明史观以及对亚洲、中国的蔑视思想,势必会对近代中国的认识及对华态度和政策产生消极影响。

再次,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梳理幕末明治初期日本的对外认识,对探讨和理解中国的近代化及相关问题大有裨益。

在学术界,日本往往被当作东亚乃至非西方世界由传统社会向近现工业社会转变的成功范例受到关注。而且,关于中日两国近代化历程的

^① 松泽弘阳:《近代日本的形成与西洋经验》,岩波书店,1993年,第75页。

比较研究也是热点问题之一。有学者指出: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起步处于同一时代,相比而言,“日本并不具备向现代化转变的丰富物质资源,也不具备这方面的文化资源,而中国在这两方面都拥有无比优越的条件。但是日本对世界大势有比较清醒认识和广求宇内知识的热忱,使日本的文化资源得以迅速革新和增长。这些革新的文化资源成为推动日本物质财富巨大增长的精神动力”。“中国对现代世界认识的严重滞后成为阻碍中国进行现代变革的难以估量的因素,一直到19世纪末,还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变所必需的基本认识的转变。”^①不言而喻,探究中国和日本在思想认识方面的共性及各自的独特性,是考察两国近代化进程之异同的一个重要视角。

也有日本学者提出:近代中国和日本是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实现开国的,但近代化进程并不相同。其原因:首先,清政府和德川幕府对待西欧的冲击所采取的态度不同。其次,二者的态度之所以不同,主要在于面临西欧之冲击的两国的体制与秩序——华夷秩序和大君外交秩序不同。概言之,中国和日本在开国以后所走的道路迥然不同,中国成为西欧各国的“食饵”,而日本则能避免这一命运,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面临西欧的冲击时,“大君外交秩序先于华夷秩序而迅速采取近代化——由欧化而实现近代化——的政策”,“华夷秩序与大君外交秩序,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制和秩序”。而且,后来中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结局之所以完全不同,追根溯源,也与两国“对西欧的冲击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实行近代化的做法”有关。^②

毋庸置疑,中日两国在近代化道路的选择及其进程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与两国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武力威胁和文化冲击时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不同密切相关。但笔者以为:中国的华夷秩序体系与日本的大君外交秩序体系,并非“完全不同的体制和秩序”,二者的理论基础都是以自我中心论为特征的华夷世界秩序观,且后者是对前者的模仿和移植。换言之,日本的华夷世界秩序观与中国的华夷世界秩序观核心内容基本相同,但由于两个国家在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日本的华夷思想具有自身的特点。因此,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的军事压力和文化冲击,比之于中国,日本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① 罗荣渠:《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一项比较现代化研究》,《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② [日]信夫清三郎著,周启乾译:《日本政治史》第一卷“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7页。

三

本书主要由绪论、正文七章和终章构成,具体研究沿如下思路展开:

第一,以幕末遣欧美使节这一经历较为特殊的群体——有机会亲身前往西方国家以及中国的香港、上海进行实地考察的一群人——为切入点,通过对他们的出使日记等原始资料进行实证分析,梳理、剖析他们的西洋认识和中国认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幕末明治初期日本人对外认识的总体情况及其发展趋势。需要指出的是,幕末日本遣欧美使节的核心任务是处理相关的外交事务,他们对西洋事情的考察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和随意性,这与后来由明治政府派出的岩仓使节团有组织、有计划的考察不大相同。不过,笔者以为,正是由于这种随机性和随意性,决定了幕末遣欧美使节在出使日记中所体现出的思想认识最本真、最客观,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此,本书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对幕末遣欧美使节的出使日记尽可能详尽地做了整理和介绍,既为下文展开论述提供铺垫,也希望能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一定的资料信息。而且,本书的立意所在,是考察近代初期日本人对外来军事压力及外来文化冲击的反应和应对模式,因而未就日记资料逐一进行具体分析,而是留待第四章,比照日本华夷世界秩序观的特点予以综合评析。

第二,前近代的日本,主要以华夷世界秩序观作为认识世界和指导国际交往的准则。^① 日本的华夷思想,是在吸收中国华夷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核心内容与中国的华夷思想相同,即以儒家的“礼”所指代的文明发展程度为基准,将世界序列化,并力图将自己国家置于“中华”——世界中心的地位,视其他民族、国家为野蛮落后的“夷狄”。幕末日本对外认识的思想基础仍是华夷世界秩序观,一些遣欧美使节的出使日记中常用“胡”、“蛮夷”、“夷人”和“腥膻”、“僻境”等词语指称或形容西方人和西方国家,或者

^① 本书的初稿是作者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在论文写作及书稿的后续修改过程中,曾从中提炼出若干篇文章公开发表,其中包括《中日华夷思想之比较》(收入《近现代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日本华夷思想的形成与特点》(收入《日本研究论集2003》,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等。后来,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发现一篇题为《日本型“华夷思想与华夷秩序体系”》(2006年)的文章,经比对后发现,该“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的内容(主要论点以及绝大部分文字表述),与笔者早先发表的《日本华夷思想的形成与特点》一文出奇地“相似”。特此声明:笔者的相关成果为原创性研究。

批评对方“无礼”、“无尊卑之别”、“无性别之分”、“唯利是图”等。而且,出访期间,当他们发现西方“蛮”、“夷”之国的繁荣和富庶程度远远超出了自己的心理预期时,有人出发“何量僻境如斯富,中华不及胡为乎”的感慨。当然,由于受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日本的华夷思想具有一些不同于中国华夷思想的特点。首先,中国的华夷思想是与“天下”观念相结合的一元中心的世界秩序观,日本的华夷思想则是一种与“国家”观念相结合的多元中心的世界秩序观,比较而言,日本的华夷思想更具开放性。其次,中国华夷思想的承载者主要是文人士大夫,而日本华夷思想的承载者则是武士。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对“夷狄”往往采取“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消极应对方式不同,由于武士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具有明显的军事性特点,使得日本的华夷思想在面对“夷狄”时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主动性甚至是攻击性。正是基于这种开放性、主动性和攻击性,日本的华夷论者更容易接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对异己事物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包容性。幕末遣欧美使节中的“汉学者”成员,在固守华夷思想的同时,又能对西方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的先进性予以认同,即缘于此。

第三,近世中后期,针对传统儒家视中国为“中华”的华夷思想,在古学派、水户学派和国学、兰学思想中出现了强调日本才是“中华”的日本中心主义论调。其中,兰学者基于从荷兰汲取来的近代自然科学成果,对“腐儒庸医”的中国崇拜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不过,他们并非完全否定儒学及其华夷观念,而是为了扫除种种思想障碍,赋予兰学研究以正当性和合理性。实际上,绝大多数兰学者是在儒学教养的基础上开始研习兰学的,兰学主要被当作“圣贤之学”的辅助。其主要特点,是重视实用性和偏重技术,故而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往往采取急功近利式的吸收、利用。兰学思想中这种对外来文明以片断的知识、技术为中心的吸收方式,也被幕末洋学继承下来。此外,幕末洋学作为一种军事科学,研习者主要以下级武士居多。到德川幕府末期,研习洋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那些身份、地位低下者立身处世乃至出人头地的途径或一种手段,洋学者摆脱了“历来的家臣”身份,成为新型的“知识人”或“技术人”。当然,这种新型的“知识人”或“技术人”具有自身的性格特点,体现在幕末遣欧美使节中那些“洋学者”成员身上,是他们往往偏重于对西方科学技术层面、特别是军事技术层面进行考察、探究,而对其他方面较少关注。

第四,近代日本对外认识的核心内容包括西洋认识和中国认识两大部分,二者之间相互影响、互为表里。幕末以来,随着对西洋“长技”的接受和认同,日本对中国的评价显著降低。日本对中国评价的转变始于鸦片战争